

· 中国慈善史研究 ·

慈善网络与城市社会整合： 近代上海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空间扩张

阮清华 梁羨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上海开埠后,英美租界与法租界迅速崛起为城市重心,传统老城厢在城区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则开始相对衰落。在此过程中,上海本地士绅与外来华人移民依托老城厢的慈善组织与资源,通过众人接力和代际传承方式不断向租界拓展慈善救助事业,不仅为租界发展注入了华人力量,更借此积极融入租界都市社会。本地慈善家与外来华人移民通过在老城厢、租界及闸北新城区慈善组织中的交叉任职,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慈善网络。这一网络既强化了华人社群的内部凝聚力,为应对外侨竞争提供了坚实基础;又有力推动了新兴都市社会的整合,成为华人参与并影响租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在近代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持续拓展,既深刻折射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与文化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和整合力,更有力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华人慈善;空间扩张;租界;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5)06-0103-09

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在老城厢北面先后开辟了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英美租界后来合并成为公共租界)。在租界发展的同时,闸北迅速城市化,成为一个新城区。南面的老城厢和北面的闸北区由中国市政当局管理,而占据中心位置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主要由外来的英美法等国侨民和殖民者管理,由此形成近代上海“一城两制三府四区”的特殊市政格局。租界不断扩张,从最初的几百亩扩大到数万亩;人口也不断增加,城市化迅速推进,上海城市重心无可避免地向北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也随之在两租界遍地开花。本文想讨论的是:在两个被洋人实际控制的租界新城区,华人慈善组织如何进入并发展?作为移民社会的上海,外地华人如何参与上海慈善事业?华人慈善组织在一个“华洋杂处”、移民与土著并存的新兴都市中,如何发挥整合异质社会的功能?^①

一、“接着办”与“照着办”:华人慈善事业在租界的扩展

1843年11月,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五口对外通商,上海正式开埠。上海“以港兴市”的特

^①关于上海慈善史研究的梳理,参见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9页。关于本地人和华人移民对上海租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各方面涉及者众,而专题论述者则少,可参见张济顺:《张在新与清末民初的译书及辞书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230页;周武:《近代口岸社会再认识——晚清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许国兴、祖建平主编:《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3、4期;[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周育民校:《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

点在这个时期已经非常明显，县城内外临近黄浦江的东面和南面比较发达，而西面和北面都还没有发展起来，尤其是城墙之外的北面和西面是农田环绕的未开发状态。此时城厢内外比较繁华的城市化区域约两平方公里（3000 亩左右），居住人口 20 万左右。^①

1845 年，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夏礼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草拟《上海土地章程》，正式在县城北面洋泾浜以北地区的 830 亩土地上设立英租界；1848 年，扩展到 2820 余亩，北面离苏州河南岸仅剩一步之遥。同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与代理上海道台吴健彰口头约定，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地带设立美租界，具体界址未定。次年，法国人在县城城墙北面和洋泾浜之间的 980 亩土地上建立法租界。至此，县城北面靠近黄浦江岸线的地段基本上被三国租界瓜分。此后，英、法租界向西拓展，从陆上包围县城；美租界则向东北方向扩张，继续抢夺黄浦江岸线。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上海两个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面积达到 60 多平方公里^②，是开埠初期上海老城厢面积的 30 余倍。而华界老城厢南面和东面被黄浦江阻隔，北面和西北面被法租界包围，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只有西南城外一小片地方。因此，随着城市重心向城北租界转移，华界老城厢的发展空间被严重压制。

在租界建立后，上海老城厢传统慈善组织几乎是紧跟着租界的扩张步伐而不断拓展在租界内的慈善救济业务，并在坚守中不断学习外来的慈善理念和方法，不断进行组织调适和改组，以适应新的都市环境需要。根据现有资料可知，晚清到民国结束，整个上海新建华人慈善组织至少 245 个，见表 1。^③ 清代前中期，上海慈善组织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于城厢内外，各乡镇有零星分布。晚清时期，老城厢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最多，公共租界和乡镇亦建不少，法租界有 2 个，华界新城区闸北有 5 个。民国时期，公共租界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数量远远超过老城厢，但老城厢地区慈善组织的数量依然多于法租界和其他乡镇，闸北区的慈善组织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法租界在 1914 年最后一次大扩张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迅速繁华起来，因此这一时期法租界新建了不少慈善组织。

表 1 上海慈善组织的区域分布(单位:个)

地区	时段		
	1710—1854	1855—1912	1912—1949
老城厢	6	31	33
公共租界	0	21	54
法租界	0	2	23
闸北	0	5	13
其他乡镇	14	21	23
合计	20	79	146

资料来源：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表 1—1、表 1—5 和表 3—10。

租界在短期内迅速兴建的大量华人慈善组织，与老城厢传统善会、善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60 年，英租界建立了第一个华人慈善组织同仁保安堂。其创办缘由是因为租界“未有善堂收埋毙尸事宜”，因此由同仁辅元堂任之，但由于城墙和壕沟阻隔，且距离较远，“报殓需时”，又由绅商席裕宽、张斯臧、张聚云、瞿开璇、谢荣施、陈熙元等创设同仁保安堂，与同仁辅元堂分工办理慈善事业。英美租界埋骼、收尸事宜归同仁保安堂负责，法租界和老城厢归同仁辅元堂负责；而租界恤嫠、赡

①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②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1 页。

③这里统计的是我们确切知道成立时间，并且确认了其大致位置的慈善组织（不能完全排除少数地址有误或区域判断有误），不包括部分知道名字，但没有具体成立时间、地点等信息的组织，也不包括行业、同乡、宗教等团体设立的具有慈善功能的组织。

老等事宜则“皆仿同仁辅元堂行之”。也是因为这次分工，1862年同仁辅元堂在法租界设立了分堂，办理法租界掩埋事宜。^①由此可知，在此之前，设在城内的同仁辅元堂已经主动承担起了两租界内的路毙尸骨收敛、掩埋工作，应该是最早进入租界推行善举的华人慈善组织。

同仁永善堂是公共租界比较早的综合性善堂，创办于同治八年^②，由王承绪、同养信、郑增华等奉上海县令之命设立^③，设有南北两堂，办理施粥、恤嫠、赡老、义塾、施衣、施米等十项善举。^④目前我们缺乏更多关于该堂的信息，但堂曰“同仁”，也许与同仁辅元堂有关，或者可能受到同仁辅元堂的影响而办；南堂设大北门外西首，北堂设盆汤弄，先南后北，从靠近华界的法租界开始创办，后到公共租界设北堂，似乎也能看出其发展轨迹。^⑤

闸北新城区较早设立且影响比较大的慈善组织是同善粥厂，同样由来自老城厢的果育堂和普育堂董事联合创办。^⑥新普育堂是另一个典型例子。1912年3月，为应对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倒台而失去官款补助，慈善组织难以为继的局面，果育堂、普育堂等老城厢12家慈善组织在同仁辅元堂商定成立上海慈善团，“酌盈剂虚”，统一管理所有老城厢慈善产业，统一规划办理各项善举；并商定成立新普育堂，集中办理收养穷民无助者以及施医给药等业务。^⑦新普育堂在老城厢成立后，即开始积极拓展界外业务，1916年在江湾、1918年在松江设施医分局，1920年在闸北、公共租界的杨树浦等开设施诊所多处，到1921年，在老城厢以外的施医分局即达八处之多。^⑧也就是说，新普育堂是继承老城厢普育堂而来，随后在上海各城区和多个乡镇设立分支机构，基本上就是老城厢华人慈善组织走向租界和新城区的缩影。

这些慈善组织主要由上海士绅和外地来沪移民在新城区“接着办”老城厢原有的善举，基本上是将老城厢慈善组织“复制”到新城区，或者是设立新的分支机构。还有一类慈善组织则是外来移民仿照老城厢慈善组织的形式，在租界等新城区“照着办”善举；有些与老城厢慈善家群体合作创办新慈善组织，或者在新组织中吸收老城厢慈善界人士加入董事会等管理机构，继续“照着办”慈善。

设立于公共租界的仁济善堂是后一类组织的典型。仁济善堂建于1880年，亦称沪北仁济堂，以区别于老城厢仁济堂（其后来将业务移交给了果育堂）。同年，外地在沪士绅陈凝峰等10人集资在英租界租赁民房开设文明局，是为仁济善堂前身。文明局最初仅办理惜字和放生两项非常传统的善举。1881年，文明局会员增加12人，善举也扩展了印送善书、施衣和给米三项。此后局所改租到大马路（今南京路），改名中和局。1883年是该局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年陈竹坪、李秋坪^⑨等30位沪上名流加入，并将局所迁移到六马路（今北海路），正式改名为仁济善堂。1884年，仁济善堂在北新泾设立分堂。1885年，施善昌^⑩将丝业公所收到的因冬天结冰封河而无法北运的各省赈捐中部分剩余棉衣，以仁济善堂的名义分发给了沪上推小车的穷人。此事进一步扩大了仁济善堂的影响。此后，在

^①⑥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建置》，（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12、315页。从有限资料可知，这些创设善堂的人中既有上海老城厢本地士绅，亦有外地到沪经商致富者。席裕宽，字华峰，苏州洞庭人，上海开埠后在洋泾浜附近开杂货店起家，后创办华记栈，成为沪上富商，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进攻上海时都曾捐款助清军，后获同知、道员衔，并赏花翎。张斯臧，字宝楚，冯泽夫编《英语注解》时专门找他会商，可见其懂英文。瞿开琏是老城厢士绅，积极参与同仁保安堂的创办。陈熙元可能是嘉定人。

^②《善堂案结》，《申报》1895年11月11日，第3版。

^③《永善堂告白》，《申报》1873年1月9日，第5版。

^④《书论善举后》，《申报》1874年11月13日，第3版。

^⑤《同仁永善堂司董来启》，《申报》1889年12月25日，第4版。

^⑦民国《上海县志》卷10《慈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⑧《新普育堂十周年纪念会》，《申报》1921年4月14日，第11版。

^⑨陈竹坪，浙江湖州南浔人，著名丝商，“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倚之为长城”，曾任美商旗昌洋行买办，江南义赈绅商领袖之一。李秋坪，江西人，著名丝商，曾任高易洋行买办，创办高易筹赈公所，积极参与两粤、江南、河北等地义赈。

^⑩施善昌，浙江湖州人，著名丝商，长期担任上海丝业公所总董，江南义赈领袖。

外地来沪巨商朱葆珊^①、叶澄衷^②等人赞助下,集资 2000 元,在六马路购地 4.5 亩,兴建楼房、平房 30 余间,作为仁济善堂办公场所,并延聘施善昌、李秋坪、刘芬相继驻堂办事。在施善昌等人的主持下,仁济善堂业务不断扩展,举凡恤嫠、赡老、施米、施医药、施材、宣讲乡约、义塾、粥厂、义冢、掩埋、育婴、协赈等各项善举无不办理。^③

施善昌、李秋坪等作为晚清义赈领袖,在此后历次各地灾荒救济中,都通过仁济善堂开展收捐和赈济工作,“先后十六年,助振十三省,募款至二百余万金,传旨嘉奖者七次”,有力地扩大了仁济善堂的影响。同时,施善昌还在家乡浙江湖州创设仁济善堂,参与赈济工作。上海仁济善堂于光绪五年在李鸿章的奏请下获得御赐“惠周泽洽”匾额,施善昌本人获得光绪帝御赐“心存济物”匾额,都在无形中增加了该堂的名望。^④由此可见,仁济善堂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偶然性,很难说是为了对抗同仁辅元堂和果育堂而设立。^⑤与其说是对抗,不如说是外地来沪绅商在租界“接着办”(仁济堂)或“学着(同仁辅元堂)办”慈善,这是老城厢华人传统慈善事业的扩展,也是外地来沪华人积极参与租界都市化过程的举措。如果有对抗,那也主要是对抗洋人,而非老城厢华人;即使有竞争,也是为了更多救助弱势者,更好维护都市社会发展,共同促进慈善事业的进步,而非主动获得功利性目标。

1919 年,仁济善堂改组董事会,朱葆珊出任总董,王一亭和施善昌的儿子施则敬出任副总董,黄涵之等参加董事会,“拟改良,力图完善”。^⑥仁济善堂慈善事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另外,由于仁济善堂位于公共租界六马路,交通便利,屋宇恢宏,经常成为其他慈善组织和社会团体开会议事之处,如 1922 年上海中医联合会即在仁济善堂召开;^⑦1927 年普善山庄也曾借仁济善堂开董事会。^⑧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仁济善堂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仁济善堂不断添置产业,尤其是在租界繁华地段购置房地产。到 1931 年,其拥有各处地产 61.8 亩,总价值 174 万元;房产 192 幢,总价值 20 万元,大多数用于出租取利维持善举。其地产和房产价值在上海主要慈善组织中仅次于上海慈善团。1928—1930 年间,仁济善堂每年房地产租金收入高达 8 万余元,占其全部收入的 80% 左右。^⑨因此其慈善活动经费比较稳定且可靠,这也为其持续不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仁济善堂机构的完善和财产规模的不断增加,尤其在施氏父子、李秋坪、王一亭等人的努力下,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逐渐发展成公共租界最主要的慈善组织。1927 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将会所设在仁济善堂。^⑩在此之前,同仁堂是晚清上海“诸善堂之冠”;^⑪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上海慈善团,则将事务所设在同仁辅元堂。^⑫而慈联会会所设到仁济善堂,既是对仁济善堂在整个上海慈善界地位的肯定,也象征着上海慈善事业的重心已经从城内转移到城北、从老城厢转移到了公共租界。这既是上海慈善事业空间扩张的体现,更是上海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上海租界都市化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 朱葆珊,又名朱葆三,浙江定海人,日商平和洋行买办,先后创办或投资于华安水火保险公司、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华商水泥公司等众多现代企业,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先后参与创办或管理中国红十字会、四明公所、上海公立医院、仁济善堂等众多公益、慈善组织。

^② 叶澄衷,浙江镇海人,时人称其为“五金大王”,后投资银钱业、房地产业和沙船业等多个领域,并办有鸿安轮船公司、燮昌火柴厂、纶华缫丝厂,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出资创办澄衷学堂等。

^③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21《游寓》,第 14 页;霍会峰:《上海仁济善堂研究(1880—1954)》,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5—6 页。

^④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21《游寓》,第 14 页;光绪《归安县志》卷 18《经政略五·户口附善举》,清光绪八年刊本,第 16—17 页。

^⑤ [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577 页。

^⑥ 《沪北仁济善堂广告》,《申报》1919 年 2 月 14 日,第 3 版。

^⑦ 《中医学界之大联合》,《申报》1922 年 6 月 11 日,第 14 版。

^⑧ 《普善山庄董事会记》,《申报》1927 年 6 月 21 日,第 15 版。

^⑨ 胡兵:《上海仁济善堂的经费收支及相关因素分析(1880—1954)》,《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 年第 3 期。

^⑩ 《各慈善团体组织联合会》,《申报》1927 年 4 月 6 日,第 15 版。

^⑪ 同治《上海县志》卷 2《建置》,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 23 页。

^⑫ 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第 90 页。

如前文所述，公共租界在民国时期至少新成立了 54 个慈善组织，法租界新建 23 个，两者合计 77 个，超过整个上海地区新建数量的一半。而且，租界地区此前已经建立的慈善组织也大多仍在继续发展，数量、规模和影响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并且，两个租界和闸北地区早期的华人慈善组织，实际上都是由老城厢慈善组织扩展而来，或者至少是在其影响下设立。租界和闸北新城区甚至包括部分乡镇地区慈善组织的建立，是老城厢华人绅商积极主动参与都市化进程的结果，或者说以老城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并未缺席；在租界和闸北新市区的发展中，同样可以看到老城厢的影响，更可以看到上海本地和外来华人绅商的巨大作用和贡献。

二、“有城不若无城富”：城市重心位移与华人慈善群体的代际传承

近代上海兴建了数以百计的慈善组织，背后则是数百、数千个善士在维持和张罗，同时吸引成千上万乃至数十百万普通民众参与捐助和奉献。有学者专门讨论过近代慈善家群体，但大多只提到那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如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施善昌、郑观应、严佑之、张謇、熊希龄、李平书、王一亭、施则敬、沈敦和等人，且未对这一群体具体化，读者依然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① 这些人中，除了李平书是上海老城厢土著出身、经元善长期活跃于老城厢外，还有很多长期活跃于上海租界慈善事业中，几乎都是外地移民，他们在上海租界慈善事业中的崛起，正是借道老城厢慈善组织和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结果。

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事人群体有一个明显的迭代过程，即从本地家族传承到外地移民精英主导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慈善组织从老城厢向租界的扩张和发展几乎同步发生，其背后则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重心的位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市精英阶层的代际传承。老城厢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家族传承的特色，尤其是创办者家族在后世的管理层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慈善组织进入租界后创始人家族逐渐失去对慈善组织的控制，代之以各种力量的参与和共同维持。

1800 年，在上海知县汤焘倡议下，上海地方士绅，也是老城厢著姓朱氏家族的朱文煜^②、号称“城西首镇”的法华镇士绅徐思德^③等倡设同仁义冢；1804 年，上海士绅在城内药局弄购买乔氏房屋，正式设立同仁堂。司总李炯^④、朱朝坤、陈元锦^⑤、乔钟吴^⑥、张梦松、李心泰等，司事者曹鸿焘、陈昇、瞿安楷、唐国壅、唐家松、田树基、龚淦、朱文煜、陆锡眉、孙馨、张士谋、沈基丰、曹洪怒、江发瑞等多为上海本地人。^⑦ 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同仁堂创始人家族始终在管理人员队伍中占据重要地位。^⑧

1843 年，上海梅益奎与海门施湘帆、慈溪韩再桥等募捐设立施棺栈，司事者朱增龄、朱增惠、王揆、江驾鹏、李成凤、沈崑、费培镇、陈炳奎、林灏、龚锡华、金修椿、郭儒栋等。^⑨ 越三年，赁药局弄同仁堂后陆氏房屋设施医局，合局栈为一，定名辅元堂。^⑩ 因此同仁堂和辅元堂此时已经设到一起了，堂宇

^① 王国庆：《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 11 页；廖良梅：《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的慈善事业述论》，《求索》2004 年第 12 期。

^② 参见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上册，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582—584 页；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7—408 页。

^③ 徐思德，上海县人，出生于城西法华镇，嘉庆四年倡捐重建法华镇百步桥。嘉庆二十三年，同仁堂再次重修该桥。参见民国《法华乡志》卷 2《津梁》，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42 页。

^④ 李炯，著有《蔚云诗屋文稿》，多次参与法华镇灾荒赈济，与其他士绅一起设立粥厂施赈、办理平籴等。

^⑤ 陈元锦，嘉庆六年还捐建露香园清莲阁大士殿、海印堂等。

^⑥ 乔钟吴，字云门，号鸥村，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先后出任直隶满城知县、甘肃岷州署盐茶同知，以母老告养归里，丁艰不复出。曾祖乔恩，自闵行镇迁县城，以服贾致饶，乐施好善；祖父乔起凤亦有善名。

^{⑦⑩} 同治《上海县志》卷 2《建置》，第 23 页。

^⑧ [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542—543 页。

^⑨ 这些人可能都是上海人，部分人信息不全。王揆，字永锡，号冶山，国子生，上海著名沙船商人，熟悉洋情。江驾鹏，字翼云，号果存子，上海人，诸生，工医善文，参与多个慈善团体创办，1846 年与陈炳奎、叶介寿等募捐设立全节堂，还与费培镇、欧锡麟等集资创办老城厢另一著名慈善组织果育堂。郭儒栋，字益森，号松云，上海人，恩贡生，博学、工诗、善画。

前后相连。

同仁堂办理恤嫠、赡老、施棺、掩埋、义学、助贫诸项善举；辅元堂主要办理施医、施棺、掩埋诸事，在业务范围上有重合，故夫马进认为二者有竞争和对抗。^①此说值得商榷。同仁堂基本上是上海本地人所办，但辅元堂首创者除梅益奎是上海人外，明确的还有海门施湘帆、慈溪韩再桥，也就是三位首倡者中有两位是外县人。梅益奎，字再春，在县志中也只讲了两件事，“幼孤，与弟友爱敦笃”，“中年后专办地方善举”，除了创办辅元堂外，也为同仁堂、育婴堂“置田数千亩”。其他二人在府志和县志中均只因辅元堂而出现过名字，没有其他事迹入志。^②府、县志如此简单地记载，可能意味着此三人并不一定具有与本地士绅“竞争”“对抗”的需要和本钱。何况梅益奎既是上海人，也参与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另外，在两堂的主要司事和司总中，最早响应知县汤焘倡议参与同仁义冢创设的朱文煜，其伯父朱朝坤后来成为同仁堂司总，其子朱增沂、增惠都做过同仁堂司赡老和司义冢的工作；其侄朱增龄又是辅元堂的司事。^③可见，主要由外地人组建的辅元堂成立后，上海本地慈善家群体并未阻止或破坏，反而积极加入，共同推进老城厢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与近代天津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本地慈善家群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类似。^④因此，同仁与辅元二堂可能存在所谓竞争的问题，而恰好反映出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的创建具有“传、帮、带”的特点。梅益奎参与过同仁堂善举，又偶然获得杭州赊棺规程，于是邀集好友另行创办辅元堂，并吸收有创办同仁堂经验的朱氏兄弟和其他同好一起参与管理工作。这一模式与明末同善会和余治倡导的育婴堂创立有异曲同工之妙。^⑤同一个人参与创办或主持多个慈善组织，或者任职于多个善会善堂，正是中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1855 年，清政府收复被小刀会起义军占领的上海县城后，开始战后重建。既是同仁堂董事，又是辅元堂董事的经纬，将二堂“合而为一”，取名“同仁辅元堂”。经纬是浙江上虞人，年轻时到上海学做生意，创办仁元钱庄和经正记沙船行，“白手致富十余万金”，后来甚至“积财至四五十万”之多，一度成为上海钱业领袖和“船商之最著者”。他热心公益事业，1847 年被推举主持辅元堂，次年兼理同仁堂和育婴堂。^⑥同仁堂与辅元堂不仅堂址前后相连，善举内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而且主事之人有多位来自同一个家族，还有像经纬这样身兼二堂董事者，为二者的合并奠定了基础。同仁辅元堂，将二者名字都包含进新堂名称中，也意味着两堂是为了共同推进慈善事业而平等合并，显示出外来移民已经深度参与到老城厢慈善事业发展中的程度。

1864 年经纬去世后，其子经元善不仅继承了其产业，也积极参与上海慈善事业，继续担任同仁辅元堂董事，并在 1877 年协助老城厢另一家重要善堂——果育堂开展协赈活动。1878 年，果育堂董事、老城厢世家代表之一的瞿世仁病故后，经元善又被推举为果育堂负责上海收解协赈款的主事人。^⑦正是通过参加协赈活动，使得经元善开始涉足洋务，从钱业经营转向近代工商企业，1881 年成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并将上海电报局发展成当时效益最好的电报企业之一。^⑧经氏父子从浙江上虞到上海创业，从钱庄和沙船运输业向近代洋务企业的转变，正是上海开埠后主要经济形态的一次转变，而两人都在经营主业的同时积极参与上海慈善事业，也因广泛参与慈善事业而融入上海乃至全国。

^①[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544 页。

^②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18《人物》，第 214 页。

^③《上海同仁堂征信录（道光十一年）》，转引自[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603 页。

^④郝红暖：《明末至民国前期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与特点》，《安徽史学》2011 年第 6 期。

^⑤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1—53 页；[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79—89、278—282 页。

^⑥光绪《上虞县志》卷 13《列传·人物》，清光绪十七年刊本，第 1 页；朱浒：《经元善：从旧式商人到新兴绅商的新陈代谢之路》，《浙江档案》2014 年第 8 期。

^⑦林吕建主编、唐晓燕等编著：《天下浙商·历史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6 页。

^⑧《经元善年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5 页；朱浒：《经元善：从旧式商人到新兴绅商的新陈代谢之路》，《浙江档案》2014 年第 8 期。

慈善网络之中，并获得进一步扩张营业的机会。

近代上海最重要的慈善家王一亭则是从洋行买办向现代工商业者转变的典范。王一亭是浙江吴兴人，早年到上海钱庄做学徒，1907年后成为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后广泛投资于现代金融和工商企业，并大获成功，成为沪上华商翘楚。王一亭一生向善，积极创办或参与管理了众多的善会善堂，与之有关的慈善组织遍及老城厢、法租界、公共租界、闸北甚至部分乡镇；如果再算上通过其领导的上海慈善团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资助和指导下的慈善组织，那就更多了。在王一亭发起创办或参与管理的慈善组织中，每一个组织的管理机构或董事会中都会有部分人员与其他组织重合，所以以王一亭为中心实际上织成了一张慈善家网络。

近代上海开埠后，城市经济主业逐渐从沙船运输、传统金融等向现代工商业和现代金融业转变；部分新兴的洋行买办在获得高额报酬的同时，果断捕捉商机，成功转身成为现代工商业者。他们在获得经济利润和社会地位的同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利用老城厢慈善组织和传统慈善文化，在租界和新城区积极推广中国慈善事业，并且前赴后继，一代代接力而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

三、“交叉任职”与华洋竞争：慈善网络与都市社会整合

随着上海老城厢主要善会善堂不断向租界和闸北推进，善堂主持者们逐渐参与到租界和闸北慈善团体董事会，甚至成为主要领导者。1920年前后，同仁辅元堂总董、上海慈善团董事会主席王一亭先后出任仁济善堂副总董、总董，闸北普善山庄总董等。^① 同仁辅元堂和上海慈善团其他董事如黄涵之、杨东山等人也纷纷进入租界和闸北其他大型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或成为直接负责人，如黄涵之担任过仁济善堂董事长。与此同时，仁济善堂、普善山庄、闸北慈善团等租界和闸北地区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也积极参加上海慈善团等旧慈善组织的董事会，从而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② 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实际上将这些相互任职的慈善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从而形成更为强大的巨型慈善群团，成为上海慈善界事实上的领导者。

在各大慈善组织主要负责人“交叉任职”的同时，上海主要慈善组织的负责人身份也在继续变化。同仁堂主要由本地人创办，辅元堂的主要创办者中有两位是外地人，到同仁辅元堂组建后，虽然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同仁堂创始人及其后代的作用^③，但更多与创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上海人及外地人参与该堂的管理。原来慈善组织的创始人以船商为主，随着沙船业的衰落，钱业、洋布业等与西方贸易更为相关的行业商人及买办开始参与到慈善组织的创建和经营之中。在租界，丝业商人如仁济善堂的施善昌、李秋坪等人一度在善堂管理上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现代工商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商人如严信厚^④等开始在仁济善堂等的经营上发挥主要作用。另外，进入民国以后，一批有钱有闲有身份有名望，且很多身兼诸多角色的著名人物，纷纷寓居上海，或是创业有成身退或半退，如王一亭、张謇、刘鸿生、荣德生、朱葆珊、虞洽卿等，或是军政失利下野，如朱庆澜、黄涵之等，或是前清遗老遗少，如关絅之等人，或是宗教界人士，如圆瑛法师、屈文六等，甚至如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大佬亦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因而到民国中后期，各传统善会善堂董事会格局大多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群体的身份、地位往往比此前那些善堂创始人或其后裔更高，也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加入各董事会后，使得这些善堂之间的联合更为可能，这也是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的前提，同时也是战时

^① 华一民：《海上慈善界奇人王一亭》，潘君祥主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② 《上海慈善团董事会名册》，上海市档案馆藏，编号：Q6-9-45。

^③ [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43页。

^④ 严信厚（1838—1907），原名严经邦，字筱舫（小舫），号石泉居士，浙江慈溪人，做过当铺学徒、银楼伙计，经营盐业致富，后开设源丰润票号，业务遍及全国，开设物华楼金店、老九章绸缎庄，经理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任第一任总经理、总董、上海分行董事长，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和华兴保险公司，成为一名跨越多个行当的实业家、金融家。自1896年施善昌去世后，严信厚成为仁济善堂在《申报》上发布广告和征信录署名最多的人，而且时间达10年之久，但目前没有资料表明他是否以及何时担任过仁济善堂的总董。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能够有效运转的重要基础。

华人慈善人士在各善堂的相互渗透和最终联合,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上海慈善界的团结与合作,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应对另一具有竞争性的对手——租界洋人。华人慈善家和在上海的绅商积极利用租界“未有善堂”的局面创办新的慈善组织,既是华人精英面对租界贫苦无依者的自然选择;亦是在一个全新的都市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激流勇进,主动参与都市建设的方式;更是在租界内与洋人开展竞争,维护新都市社会市容市貌和民族尊严的重要方式。遭遇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绅商,在克服初期的困惑后,积极投身都市社会建设,化危为机,不仅获取大量财富,同时将部分财富回报社会,开展慈善救济、市政建设、卫生管理等。维护市容市貌,在他们看来同时也是维护自身尊严,进而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租界内早就有由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创办的慈善组织,如 1869 年天主教拯亡修女会创办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1903 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办尚贤堂等。^① 圣母院育婴堂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是晚清民国时期全国闻名的天主教慈善机构。^② 尚贤堂主要以“国际学会”的名义活动,所办学术和教育有比较大的影响,也办有医院、义学,参与义赈等慈善活动。^③ 租界内还有大量专门救助本国侨民的慈善组织,1927 年能够给租界内洋人提供免费医疗救助的外国慈善组织就至少有 31 个。^④

华人慈善组织与租界和洋人慈善组织之间,既有抗拒与竞争,又有学习、模仿与合作,同时还具有维护民族尊严的一面。租界诸多慈善组织的设立,直接缘于华人看到界内诸多不合时宜的现象,认为有碍观瞻,或于卫生文明不合,有损国人形象或予外人以话柄,因而建立慈善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如收尸、掩埋,甚至收养游民、乞丐等,都有维护华人形象,维护民族尊严之意。

总之,新、旧华人慈善组织与华界、租界华人慈善组织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任职”,进一步增强了华人在近代上海都市化尤其是租界都市化进程中的影响力,也在与洋人的竞争中维护了自身的体面。

结语:慈善是城市融合的社会媒介

上海开埠后,随着县城北面租界区的出现和快速城市化,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此方”^⑤,城市重心转向租界。在此背景下,老城厢传统民间慈善组织随之不断向新城区扩张,慈善家们也开始向租界转移,在洋人控制下的租界内接着开展各类慈善活动。与此同时,移民到沪的外地人,一部分借助原有慈善组织,积极参与上海慈善活动,“接着办”慈善;另一部分则仿照老城厢慈善组织,在租界内另起炉灶,新设善会善堂,“照着办”慈善。这些都是借助传统慈善资源和慈善文化到租界开疆拓土的必然结果。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流动与近代慈善是双向驱动的”^⑥,就上海来说,城市化区域扩展与近代慈善也是双向驱动的。综合来看,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基本发展路径是从老城厢向英美租界、法租界和闸北新城区扩张;周边乡镇则继续延续着传统路径发展。早期在两租界和闸北等新城区出现的慈善组织,大多直接由老城厢慈善组织兴建,是旧慈善组织的新分支;后期的慈善组织虽多由外来华人移民新建,但有明显模仿或学习老城厢慈善组织的

^① 1872 年法国人在上海创办有首善堂,这个以“善堂”为名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专门从事房地产管理和收租的机构,主要资助教会的活动,未见其开展一般慈善活动。

^② 张化:《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婴儿死亡率揭谜》,《世纪》2013 年第 4 期。

^③ 霍沁艳:《尚贤堂研究(1894—1927)》,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饶玲一:《尚贤堂研究(1894—192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不过,这两篇同名学位论文,都很少提及尚贤堂的慈善事业。事实上李佳白及尚贤堂在参与中国慈善尤其是义赈等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当时的许多报纸均有相关报道,如许士骐撰《记德国名汉学家卫理贤博士》(《申报》1931 年 6 月 23 日第 16 版)就特别提到尚贤堂“办理慈善事业”的事情。

^④ 《工部局卫生处关于病人免费入院手续事宜(1927—1928)》,上海市档案馆藏,编号:U1-16-530。

^⑤ 颐安主人编撰:《沪江商业市景词·南北两市》(1906 年),潘超、丘良任、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2—263 页。

^⑥ 周秋光、万佳敏:《论社会流动对慈善近代化的驱动作用》,《安徽史学》2024 年第 4 期。

印记。不管是“接着办”，还是“照着办”，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也是老城厢士绅和上海新移民在与租界洋人竞争和合作中可以借用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

对于那些早先进入上海老城厢的外地人，或者从上海周边进城的人来说，随着租界的扩张和发展而一步步从老城厢向租界扩展似乎是必由之路。这既是近代上海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也是这些先行者保持他们早先进入到老城厢以来，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需要。他们通过积极参与租界各项社会事务，如慈善救济等，继续保持在上海的身份和地位，也方便更好地融入上海都市社会。实际上，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积极进取进入租界发展，同时也借助了老城厢慈善组织等社会文化资本，并通过在租界进一步参与慈善事业等来维护在都市社会中的地位。

两租界内不仅慈善组织越建越多，其中部分组织，如仁济善堂的规模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最终后来居上，成为上海慈善界的中坚和领导者。民国中后期，老城厢和闸北慈善组织的主要领导者，纷纷进入租界慈善组织董事会等领导机构，通过交叉任职或兼任职务的方式，成为租界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老城厢和闸北慈善界人士从南北两面进入租界慈善组织，并最终领导了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发展。

因此，华人慈善组织在租界的扩张，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华人社会资本的扩张，也是租界华人与洋人争夺慈善事业主导权、领导权的竞争，有与洋人抗争的、民族主义的一面。上海土著与外来移民，华人与洋人，通过慈善事业这一媒介，都更好地融入上海都市社会之中，整合了上海都市社会的发展。

作者简介：阮清华（1976—），男，湖南宁乡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梁美飞（1983—），男，广东茂名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郝红暖

Charitable Networks and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in the Concessions of Modern Shanghai

RUAN Qinghua LIANG Xianfei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After Shanghai was opened as a treaty port, the traditional old city area (Laochengxiang) declined relatively in terms of urban scal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British – American Settlement and the French Concession quickly rose to become the city's center. In this process, local gentry in Shanghai and immigrants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relying on th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resources in the old city area, actively expanded charitable relief undertakings into the concessions.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peopl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se undertakings kept expanding, which not only injected Chinese strengt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ssions but also enabled them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urban society of the concessions. Local philanthropists and Chinese immigrants wove a huge charitable network through their cross – appointments i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e old city area, the concessions and the new urban area of Zhabei. This network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internal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provid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ping with the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nationals,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merging urban society,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hinese to participate in and influenc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conce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hanghai's urbanization,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haritable undertakings by the Chinese in the concessions not onl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strong vitality, and integration contained in traditional charitable resources and culture, but also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value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hilanthropy; spatial expansion; concessions; social integration